

钱鍾书  
修改  
围城

张明亮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前 记

“前记”其实“后语”；“前”与“后”往往会颠倒。一九八七年八月我为本书写的《前言》似已成为明日黄花；不过对读本书仍有参考意义。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我将拙书稿寄给四川的一家出版社，在也就是后来该社出版所谓“汇校本”《围城》的责任编辑手里压了大半年后于一九八八年被退回。所以我现在的这本书当然不是在“汇校本”（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之后才写成的；这一点，该责任编辑可以替我作证，他在收到我的书稿后来信就证实了我的“优先权”：“您的这稿选题好，属于开垦性的劳动，倘列入我社计划，是准备赔钱出书的”。为避欺世盗名、窃取或利用别人劳动之嫌，我理所当然有必要至少将“先后秩序”问题，向读者作一简略交待。

原书稿耗尽精力，《文艺复兴》初刊本、晨光版

一、二、三版，新版一、二、三、四次印刷本，逐一反复校勘，前后三年功夫，辑录得全部“异文”达 512 条（每条又有若干细小的异文）。“笺评”稿也从头至尾修改了三次。原材料和草稿积累了好几大包，现在还保存着。这一次是四易稿：删存为 129 条，“笺评”重新修改，加上小标题；删掉 384 条，占条目的 75%，都是些不具“典型修改”意义的琐屑变异。至此，我可以自信而负责任地对读者说，我的书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或“变相盗版”书。

此书撰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江秉祥、解正德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他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于华南师范大学

# 前 言

我闯进钱鍾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冒昧地想对它的修改过程作一番考察。我原以为比勘版本、考辨异文，不过是仅徵词翰，属于“作场或工房中批评(workshop criticism)”(《管锥编》1215页)，费力固然不少、费神不会太多的。没料想实干起来，反而觉得比做“崇论宏议”的大块头文章要艰辛得多！钱鍾书先生不甚赞成“好为空门面、大帽子”的衡文谈艺(同上 1280页)，于“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反复致意(《谈艺录》572页，568页)，我是有所体会了。

钱鍾书修改《围城》，非比寻常；是《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的作者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名著，是学者(兼作家)修改作家

(兼学者)。钱鍾书的论著中就有系统而精博的语言学理论,许多都超越了通行的语言和修辞学教程的范围,涉及到模糊语言、语言心理、社会语言、比较语言等国内至今仍属“冷门”的领域。我发现,这些理论不少都体现在《围城》的创作和修改的实践中,“有若良工示璞、巧妇留针绒迹者”(《谈艺录》397页)。要把学者的理论同作家的创作实践即修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真谈何容易!

我的考察的艰难,还体现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众所周知的命题中。文学作品,尤其是大匠名篇,是“语言生活得最强烈的地方”(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毋宁反过来说,是“生活得最强烈的语言”,赋予了文学作品巨大的生命力。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强烈性”恰也在作家锻炼语言的过程中集中地体现出来。章实斋《文史通义·说林》:“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大匠名篇的语言之所以具有那种独特而神奇的艺术魅力,不正是作家把成吨成吨的语言矿石炉锤成烧指柔的精钢的结果吗?处在炉锤过程中的语言不是具有较在其他环境条件下更为强烈而集中的运动和变化吗?作家修改作品,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会关涉到作家

本人(他的学识、才气,乃至他的品格),关涉到作品本身(那是一个生气贯注的语言天地,一个复杂丰繁的人的世界),还会关涉到读者(修润作品的根本目的就是加强作品的艺术感受的效果,即为了读者;作家同时也必然处在审视他的作品的读者的地位)。这一过程中文学语言的运动和变化,显然至少包含有作家心理、读者心理、作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异,等等。要把上述这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又谈何容易!

无知胆怯也会胆大,我终于总算完成了对《围城》的“地层勘探”。我必须赶紧承认,我的勘探并不精密,也不深入。“藏拙即巧,用短即长”(《谈艺录》97页)——我的工作只老实固守《围城》,而不作“围城”以外的好高骛远——语言还关乎哲学,当代分析哲学就是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那样的大问题是“宏观”学者的范围,我的工作是典型的“微观”。《围城》作者的谈艺理论,凡我发现能够联系到《围城》的具体修改的地方,我都努力领会并运用到考察中去;而其中就已包括许多具体有关的理论,诸如“运典隶事”、“比喻”、“反对为优”与“双关机趣”、“丫叉句法与章法”、“散文不废声音之道”、“乱道亦自有道”、“上下文”与“语言天地”、

“情感辩证”与“语言含糊”、“事物当对”、“诗以虚涵二义见妙”、“声音烘染寂静”、“多改”与“过改”、“奥卡姆的剃刀”、“半多于全”、“先得句、后得句”、行布与照应、“学”与“别才”、“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作家与小说人物“同情”或“通情”、“阐释之循环”，等等，差不多每一项都具有可作专论的内涵，都不是轻易可以理解和随意可以联系到修改上去的，已足够我穷气尽力而须为学知止的了。

“自首减等”（《管锥编》1302页）很可能就是“不欺售欺”（Honesty is the best deception）”（同上1155页），所以我也不敢妄自菲薄。我的工作至少为“文艺学”、“语言学”、“创作心理学”（它们或是不屑或是无暇顾及像我这样的粗笨的工作）提供了一份比较丰富和珍贵的资料。我也有所发现。比如《围城》的语言（推而广之钱锺书的语言），活泼、流利、机智、淋漓酣放而“似口不择言”（as if frenzied），我的考察说明其实“出于经营节制、句斟字酌”（同上1191页）；“至巧若不雕琢”原经雕琢，“能工差不用功”早已用功（同上1393页）——“真积力久，学化于才，熟而能巧。专恃技巧不成大家，非大家不须技巧也，更非若须技巧即不成大家也”（《谈艺录》211页）。这一点从作家大量的“补

苴罅漏”的修改可以证明，从并非疏通语脉文经的雕镂更可以证明——这类修润也同修补一样，一句数句之加，关联上下、辉映四方，说明“原文”原就照应多方、井井有序，一经镂饰便“一波起而万波随，一发牵而全身动”，如“龙腾海立、鸥鸟惊翔”。从而我便又发现：“雕金斫石”之作才经得起打磨推敲，越改越好；“刻冰镂脂”之“作”则无与于“修改”（最好推倒重来）——麻袋绣花，底子太差也（参看本书第 345 条笺评）！因而在这有限的考察之中，我也有自觉得意的时候，甚至偶尔还会产生金圣叹点评《西厢》时的那明显而典型的感受，像患有“山鸡对镜病”（《管锥编》752—3 页 849 页）似的摇头晃脑。只是我还记得“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同上 808 页）的当头棒喝，不敢头脑热得发昏，妄想也化作水仙花。至于肯定还会存在一些“深文而实浅见，附会而乏体会”（同上 990 页）的地方（尤其是对占百分之五的修改斗胆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确因才力不逮，而实无可如何——音不易知，解人难索，“盖不工于诗文者，注释诗文亦终隔一尘也”（《谈艺录》22 页）；只有期待作家和读者的批评了。

这本书的撰写，因教学工作而时断时续，又数



易其稿，前后历时三载，也可以说是“锱铢积累”而成的；这是我唯一可以放心释虑地攀比《围城》之处，我为此深感欣慰。

## 二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最早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从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一卷二期起，到一九四七年一月的二卷六期止（其间二卷三期中断一次）。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单行本，五月初版；一九四八年九月再版；一九四九年三月三版。再过三十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新版，一九八〇年十月第一次印刷，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二次印刷，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三次印刷，一九八五年八月第四次印刷。仅新版累积出书 258500 册。

我对《围城》的上述初刊本、晨光各版本、新版各次印刷本，作了反复的对校比勘。除了我认为是明显的误植和脱漏，辑录出全部异动之处，即可以认定是经作者修改过的文字，共计 512 条。<sup>①</sup>

我们能够考察到的《围城》修改，<sup>②</sup>其中有两

次是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一次是由《文艺复兴》初刊本到晨光初版，一次是新版据晨光初版所作的修订。新版第二次印刷本以后的零星修改，每次均未超过十处。晨光三版全同晨光再版，再版异于初版的变动，也不到十处（参看本书笺评第324条）。两次系统的修改，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次还有若干大刀阔斧的痛删和畅添，第二次则全然是细琢精磨的修润。两次修改的不同，贯彻了“须多改、莫过改”的基本原则（参看《谈艺录》555—558页，又《〈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定本《围城》，基本上还是它初刊、晨光版旧有的风神体态，故“此犹昔书也”；较之晨光版、初刊，定本当然更为精采，“此又非昔书也”。

本书的笺评，512条，逐条进行。每条笺评之前，先辑录各版异文——

一、“初刊”指《文艺复兴》连载本；“晨光版”指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以“Ⅰ”、“Ⅱ”、“Ⅲ”分别代表“初版”、“再版”、“三版”；“新版”指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以“Ⅰ”、“Ⅱ”、“Ⅲ”、“Ⅳ”分别代表第一、二、三、四次印刷本；

二、两种版本并列如“初版、晨光版Ⅰ”、“晨光版、新版Ⅰ”，指后者全同前者，未作改动；

三、异文辑录有两种形式，或各版全录并辑，或只录原文，然后用括号标示后来版本的修改之处，如“(交际花→交际明星)”，指改文仅改“交际花”为“交际明星”，其余都同原文；

四、新版、晨光版均标异文所出页码，以便读者查考。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于华南师范大学

---

① 本书基本完稿之后，又有机会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藏新版据以修订的晨光初版原书，发现手迹修改中还有修改若干处，本书在笺评中以“附识”的形式另作介绍。

②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晨光文藝叢書

# 圍城



錢鍾書作



晨光版封面



书影

的中國人。他說『Very wild!』。『Very wild!』。『可惜這  
馬人無此身軀，否則』

當時張先生跟鴻漸拉手，問他是不是天天『down town』。

漸寒喧已畢，應玻璃樹基都是碗，便說：『張先生喜歡收藏磁器？』

『Sure I have a look see!』張先生打開門，請鴻漸賞鑒。鴻漸拿了幾件，看都是

『成化』、『宣德』、『康熙』，也不識真假，只好說：『這東西很值錢罷？』

『Sure! 值不少錢呢， plenty of dough. 并且這東西不比書畫。買畫畫買了假的，

一文不值，只等於 waste paper. 磁器假的，至少還可以盛菜盛飯。我有時請外國 Friends

吃飯，就用那個康熙紫『油底藍五彩』大盤做 side dish，他們都覺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

也有點 old-timey.』

方鴻漸道：『張先生眼光一定好，不會買假東西。』

張先生大笑道：『我不懂什麼年代花紋，事情忙，也沒工夫翻書研究。可是我有

bunch，看見一件東西，忽然又 but I you can 翻動一動，實來地 O.K. 他們古董顧客

很好，到銀行商業地區云云。當然！你瞧一瞧罷。

當然！不少錢呢！外國朋友們。有点在竟。

做拉拉盤。

上頁下頁

# 目 录

□前记 (1)

□前言 (9)

---

1. “反言”幽默/(1)
2. 感觉细腻/(2)
3. “数目”的逻辑/(3)
4. 故意强调的数目/(6)
5. 潜意识中的“民族感”/(8)
6. 有些·有点儿/(9)
7. 标点的腾挪/(9)
8. 个性与情境(一)/(11)
9. 作者要超然于人物之上/(13)
10. “学人小说”辩/(14)
11. 刻画火候/(17)
12. 个性与情境(二)/(18)
13. 对·向/(19)
14. 和而不同/(20)
15. 删掉“典故”(一)/(21)
16. 居然·侥幸/(23)
17. 更好

# 目 录

- 乃恰好之怨对/(24) 18. 悲郁·  
沉郁/(25) 19. 客观描写与“主观  
视觉”/(26) 20. 删掉“典故”  
(二)/(28) 21. 由“羞”生“愤”/  
(29) 22. 事物当对/(30) 23. 删  
掉“典故”(三)/(32) 24. 照顾到  
吕校长/(34) 25. 三行诗译了三  
次/(35) 26. 客观叙事与“主观叙  
事”/(36) 27. 派头·排场/(38)  
28. “运典”的修改/(38) 29. 说  
“洋泾浜英语”的内行/(40) 30.  
鸿渐不乏小聪明/(42) 31. 割爱  
(一)/(43) 32. 奥卡姆的剃刀/  
(47) 33. 割爱(二)/(49) 34. 情  
境与心理/(51) 35. 叙述的两种  
“视角”/(53) 36. 个性与情境  
(三)/(56) 37. 灵牙利齿的唐晓  
芙/(58) 38. 醋入心骨的苏文纨/  
(59) 39. 视对象为蔑如/(61)  
40. 脸红·脸一红/(64) 41. 毕竟  
“遮不住”/(65) 42. 鸿渐困于“温  
瓶”/(66) 43. 补偿方鸿渐/(68)



# 目 录

44. 说“这”说“那”/(69) 45. 精雕细凿方鸿渐/(70) 46. 有“机”待“参”/(73) 47. “妙悟”乃上学之境地/(75) 48. 替方鸿渐写信/(77)
49. 文内宜照,文外留余音/(80)
50. 攀附标榜得有边有际/(82)
51. 叙述者与鸿渐划清界线/(83)
52. “垫拽”的功效/(85)
53. 吻的轻重/(87) 54. 改文好,而原文也妙/(88) 55. 言为心声/(91)
56. 说时迟,那时快/(92)
57. 对方早挂断了/(93) 58. 为什么还得追加一个比喻?/(95)
59. 排印脱漏导致修改走样/(97)
60. 柔嘉并不丑/(98) 61. 化堆朵为云烟/(100)
62. “科长”太小了/(101)
63. “笑靥”顶多只有两个/(102)
64. 好大的雨/(104) 65. 明喻·隐喻/(106)
66. 比喻的“蹩脚”可资利用/(107)
67. 放弃了《左传》章法/(110)
68. “自然”有歧解/(112)
69. 恐人眼毒,不